

且戰且走：風風雨雨二十年

萬延海（常山）

很高興在中央大學分享我過去二十年在愛滋病防治和性學研究以及社會工作方面的一些經驗，特別高興的是，我讀過第一本性學啟蒙書的老師——阮芳賦教授也在這個會議上。一九八〇年代我在上海讀醫學，我們醫學院對性的知識也是很少，一九八五年底的時候，大概就是這個季節，九、十月份左右，上海的書店開始賣一本黃皮的書，叫《性知識手冊》，阮芳賦教授主編的，我想我現在知道大部分的性學知識都是來自那本書的，這麼多年過去了也沒太大的變化，這本書一些基本的知識講得很清楚，性學也不是什麼特別奧妙的事情。還有潘綏銘老師及李銀河老師，也是我在做性學研究和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啟蒙老師，我開始進入行業的時候，也跟兩位老師請教了很多。

順著上午潘綏銘老師的話題，我也談談我對中國大陸政治制度的看法。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建立在馬克斯、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基礎上的崇尚暴力革命和鼓吹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政黨。在過去六十年當中，前面三十年是無情的鬥爭，消滅一切異己的力量，最近三十年則是相對開放

的改革的三十年。但是不管中國社會怎麼發展，利益怎麼多元化，共產黨本質上權力的、意識形態的一些基本東西還是沒有變化。如果我們問一個問題：共產黨怎麼來定義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大概共產黨自己內部還是那樣，怎麼定義真理、怎麼定義錯誤，共產黨的中央宣傳部還是站在黑白分明的思想體系，用暴力來消滅階級的敵人。另外一個，共產黨怎麼界定誰是敵、誰是友？答案也是那樣的。

我個人跟共產黨國家安全部門的員警都打過很多年的交道，我第一次被公安部門的國保員警抓捕的時候，他們多次跟我講得非常清楚：萬延海，你是要做朋友，還是做敵人？你如果做敵人的話，我們就消滅你。我說我當然不想做你的敵人，那我怎麼做你的朋友？在他的邏輯裡，不是朋友，就是敵人，那他的朋友是什麼？就是你要徹底的服從他，做他的走狗，成為專制集團的一部分，你才是他的朋友，你不能有任何的獨立性。後來我就跟他們討論，我說很多人跟我是一樣的，不想做你的敵人，想做你的朋友，但是又不能按照你的標準做你的朋友，那你共產黨怎麼辦？是不是就要製造很多敵人？這幾個員警也無能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麼多年中國所謂的改革開放，共產黨在兩個基本的問題上面——什麼是真理、誰是敵人——在這兩個問題上還是沒變化。

接下來我就簡單的講一下我過去的一些工作。過去二十年中，我的工作比較引起關注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男女同性戀的公民權利，還有一個是中國的污血問題，就是農村的農民賣血

輸血、以及使用血液用品而感染愛滋病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就是我過去二十年比較引起外界注意的事情。在這兩方面，中國大陸政府的公開的文件裡都有涉及，公安部是在一九九三年的時候對我在衛生部健康教育所的工作有一個處罰的意見，查禁我們工作。二〇〇二年的時候，國家安全部有一個案件，就是河南愛滋病的文件被我公布出去了，那個案子當中他們抓了我，後來國家安全部在中國保密法的培訓教材裡面有一個案例，就是我的案例，說萬某當年洩露了某個文件，所以我的案子是寫進了安全部的培訓教材裡去的。

中國政府對同性戀的態度還是有變化的。一九九〇年代的時候對同性戀是比較保守，最近十幾年當中，對同性戀的態度整體上來講是寬容的。我在二〇〇二年八月份、九月份被北京國家安全部抓捕的時候，三個看守所的副所長找我談話，好好的讚揚了我在同性戀研究、愛滋病防治的這些工作，他們沒有談河南愛滋病血液方面的問題，但他們（至少內部的警員）對同性戀是持開放的態度。

這二十年當中，我有三次比較長期的時間，因為在國內遇到的困難比較大，有三次離開了中國。一次是一九九七年的一月到一九九八年的二月，十三個月的時間在美國，當時的環境比較困難，政府對我們的監控比較嚴，公安部內部出了一些文件，對我們在同性戀方面的一些社會組織工作還有活動持有相當的敵意。中國的公安部下達不只一個公開的文件，起碼在一九九四、九五、九六年有三、四個文件是針對我們的工作，當時也沒有國際基金的支持。現

在回想，當時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環境，比現在政府對我們的態度要好得多，那個時候有很大的壓力，但是不會擔心被政府消滅掉，政府基本上都是遠遠的看，不會很強烈的威脅。那個時候一個主要的困難是社會還沒有開放，社會運動不像現在各種各樣的維權運動、民主運動，公民社會網路很發達，現在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可以交流自己的經驗，大家有很多圈子可以交流；那個時候沒有很多同行的交流，所以經驗上的缺乏、內心的苦悶，對自己來講可能是主要的挑戰。當時把政府的環境看得非常恐怖，擔心自己隨時會被抓起來，但是現在回想一下，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環境跟現在比，那個時候要好得多。

第二次離開中國，是二〇〇二年的十月份。當時我在八、九月的時候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抓捕是因為河南愛滋病的問題，那是在兩千年八月份開始介入的。開始的時候主要是向高耀潔醫生提供支援。最初我們也沒有想好直接去面對村民、感染者的這些行動，開始的時候只是想給研究人員寫些報告，鼓勵政府主動的來做些事情。但是等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政府還無作為，後來我們開始組織一些年輕人到當地作調查，我們也跟當地的一些村民直接聯繫。剛開始和村民及感染者聯繫的時候，我們很小心也很害怕，但是河南賣血而感染疾病的這些人，很多人把家裡的糧食、鍋呀、傢俱賣了，換得來北京的車票，河南到北京的车票大概是一百多塊錢，也就是說，當地的病人到北京來看病或者到北京來上訪，連一百多塊錢（相當於台幣五百多元的樣子）都掏不起，另外還有些婦女和小孩子。當我們面對這些病人的時候，我們都沒有

人停下來，沒有人因為政治恐懼而放棄這些工作。後來我們在當地組織一些村民，組織一些感染者的團體，弄了一些選舉，也發表各種各樣的死亡報告，有些村莊大概五年的時間裡死了兩百多人。

後來被國家安全局抓了之後，我們的機構倒因禍得福，因為抓了之後，這事情成了世界性的新聞，聯合國的網站登了，媒體也報導了，後來政府把我放了，放了之後，我們的機構成為世界上知名的中國民間團體，世界各國的基金會都主動來找我們，所以我們一下子變得很有錢，隨後我們在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八年的期間，我們資金每年都可以翻倍，或者一百萬、一百萬的往上長。相對來講，在那段時間，基金會對我們比較有興趣。

我被釋放後，引起國際上的支持，之後我們的機構主要做了一些工作。我們這個機構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工作主要還是在男女同性戀的人權、公共衛生、心理衛生的工作。最近十年，主要是在廣泛的愛滋病議題，包括污水案件的處理，還有在廣泛的社會弱勢群體做愛滋病防治工作，像吸毒人員、對毒品有依賴的，像性工作人員，包括男的、女的、跨性別的群體，還有像少數民族群體，像是新疆維吾爾民族的流浪群體當中的愛滋病及吸毒議題，都是我們比較關注的。愛滋病人、血友病人，以及流動人口的問題，我們也是廣泛關注。我們這個機構主要關注弱勢群體當中的愛滋病防治，我們不僅做愛滋病的防治工作，也做法律的工作。法律工作比較多的是輸血感染愛滋病的賠償訴訟問題，還有針對吸毒人員，在中國政策打擊之下，很多人

變得一無所有，當他們重返社會的時候，很多人面臨的困難來自於警察，所以這些人採取法律行動的意願非常強烈，我們的機構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們也做了愛滋病和公共衛生政策的呼籲，在這七、八年當中幫助其他民間組織的發展。有一段時間我們的機構像是小型基金會，一些國際基金會的錢放在我們單位，我們再給其他小型的組織，我們支援過大概有一百五十多個草根組織以及學生團體。二〇〇八年，我們試圖發展一些研究，希望能有研究人員和社群人員一起來分享，不單需要研究人員把握基本的方法論的研究框架，同時也需要社群的敏感性，讓社群的人來參與研究的策劃和過程。我們針對本地的女性性工作以及跨性別性工作者做了一些研究，還有在北京一個公園裡面針對男同性戀的群體也做了研究，在雲南的吸毒人員當中我們也做過一些研究。但是後來因為政府對我們機構進行了全面的打擊，有一些國際基金會也對我們突然發生了一些態度上的變化，有一些給我們支持的美國基金會變得很不友好，對我們提出了很多疑問，所以我們資金也減少了很多，因此最近這一、兩年，我們機構的資金就變得特別的困難。

我接著講一下我們機構在同性戀人群中的研究和工作。我們支持了同性戀的雜誌，像女同性戀的《Lc+》雜誌是我們提供支持的，還有像男同性戀的一本雜誌《Gay Sport》是我們創辦的，另外在北京和好幾個機構聯合創辦了同志活動中心，舉辦各種各樣社群交流的活動，我們也是發起機構，我們連續幾年跟組織男女同性戀的學生和友好的學生夏令營一起培養年輕的幹部

我們也在全國的男同性戀和跨性別群體中進行愛滋病的預防工作，這是一個說起來非常寒心的事。中國政府大概每年有十多億的愛滋病防治經費，還有國際好幾個億的愛滋病防治經費，但是中國衛生部門目前為止在男同性戀人群中還沒有很好的安全套產品，量也不夠，社群很多男同性戀組織的安全套供應還是愛知行機構提供的。大概從二〇〇六年到去年，我們連續五年的時間採購安全套、潤滑劑的量在五十萬以上，每年供應幾十個不同層次的同性戀社群的性安全教育活動，但是這個供應安全套的工作在今年停下來了，因為我們本身的資金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我們未來的發展，包括愛知行研究所，還有包括我自己是否能再次回到中國，一直是困擾我的問題。今年和去年，我們機構的財務一直透過私人途徑走帳，不是通過單位的帳戶，因為銀行完全把我們的帳戶凍結了。國外的錢進不來，我們的錢存進去可以用，但是中國以外的錢進不來，所以我們通過私人途徑，別人把帳打到我香港的帳戶上，然後我再把錢轉到國內去，國內的人再把錢存到我們單位的銀行帳戶上，也就是愛知行花掉的每一分錢還是可以查的，都是經過我們單位的帳戶，但是國外基金會轉到我們的帳戶來完全是通過私人的途徑來處理的。未來中國的政治走向對於民間社會的態度會是怎麼樣，這還是一個未知數。

今年以來，中國的民生部部長強調將解除對民間組織註冊上的限制，也讓民間組織可以由的註冊；衛生部部長也表示，歡迎民間組織參與愛滋病防治工作，但是具體的政策還沒變，

還是限制性的。最近半年，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有些微妙的變化，二〇〇六年開始到今年春天，可以講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和維權人士實行的是全面的監控、嚴打的政策，說白了，就是跟毛澤東時代一樣，就是消滅所有的敵人，消滅所有假想的敵人，消滅所有可能向它挑戰的人，這是共產黨的策略。但是這樣的策略在去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及今年年初茉莉花革命的浪潮當中，中國政府通過它持續對公民社會的打擊，正面臨一場全面的政治革命。共產黨可能已經意識到了這點，所以它最近半年的政策有試圖放開的趨勢，這是我個人的觀察；但是這種短期的開放，試圖表現出寬鬆的環境，是一個暫時的權宜之計，還是有可能演變成持久的來推動中國社會民主變革的機會？這還是個未知數。還有，如果共產黨面臨進一步的挑戰，它會不會再次表現得很兇狠，這也是未知數。另外一方面，通過去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事件，還有今年的茉莉花事件，特別是去年中國政府對民間組織採取全面的打擊態度，導致社會的中間力量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建設性、穩定性的力量，結果全部走上了極端的、要跟共產黨對抗的力量。所以今年的政策，共產黨多次表示了要跟民間社會友好的態度。總的來講，去年一年中國民間社會關於中國再一次的民主革命，不僅僅在中國的民間社會知識分子間引起廣泛的討論；而且關於中國再一次的民主變革，我得到的消息是，在中國的軍隊及政府裡面已經不再是個禁忌的話題，中國政府和軍隊裡面的人也在討論民主的問題，所以這是中國的一個挑戰和機會。

中國社會的力量也很多元化，社會力量本身就是有分歧的，比如說在同性戀的議題上面，

基督教的團體、同性戀團體和學者之間就產生很重大的衝突，這是當社會開放時不同社會派別的人的衝突。另外一方面，當民間社會發展起來的時候，其實出現了很多腐敗的問題，民間組織也有幫政府腐敗、貪腐的情況，幫助政府去打擊民主的力量，這樣的民間社會的組織也很多。所以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面，像我們這樣的民間組織面臨了很多挑戰，很多時候我們的挑戰不是直接來自政府，而是很多幫政府當槍手的這些民間組織，他們向我們開火的時候，我們一點招式都沒有。如果政府向我們開火，我們向政府反擊的時候，我們英雄的形象很鮮明，是跟專制鬥爭的民間英雄；但是當民間組織跟我們開火，我們反擊的時候，就有人說「你們民間組織怎麼整天吵架」、「你們怎麼不團結呢」，我們民間組織的形象就會很糟糕。

還有一些國際的組織，包括聯合國機構，實際上扮演了很糟糕的角色。現在聯合國完全淪落為中國政府的外交工具，他們也在中國試圖發展民主和人權的工作，聯合國的民主基金是給了中國政府，人權的基金也是給了中國政府，他們在中國發展公民社會組織的時候選擇中國政府同意的這些民間組織去發展，最後的結果是以聯合國民主的名義，使得中國的民主力量、公民力量反而被邊緣化了。最近西方國家要查聯合國的帳，要看看聯合國的錢是怎麼用的，聯合國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裡面究竟在人權和民主方面能做什麼？如果什麼都做不了，可以不做，但是不能假民主、人權和公民社會發展的名義，成為專制者的外交工具。

我先談到這，大家有什麼問題？

討論與提問

朱偉誠（主持人）：我們現在開放討論，也許各位可以提更多問題，讓萬先生可以講比較多他剛才沒有講詳細的地方。

積丹尼：他們是不是把你關起來好幾天，有沒有打你？

萬延海：對，二〇〇二年的八月份那次是有的，是比較嚴重的酷刑，持續了兩三天的時間，後來的情況主要還是精神上的。

與會者：我主要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之前有稍微研究一下關於愛滋病，主要三個原因，一個是毒品，一個是性行為，一個是同性戀，目前我知道臺灣的法律管制，毒品是吸毒者罪較輕，賣的人罪比較重，所以賣毒品的人被抓到，會說自己要吸的，關於這條法條，是否應該要有所改進。至於性工作，現在據我所知，在私底下是很猖獗的，甚至我瞭解到在酒店一次性行為是一萬塊，這樣私底下的性交易是否可能造成愛滋病的感染？之前有公娼，可能會定期的進行身體檢查，如果說合法化，是否會改善愛滋病的問題？另外同性戀的問題，如果同性戀合法，但是他們要依法在一定的時間去做檢查，那是不是會比不合法好？再來是您剛才說

有身體上的凌虐，那精神方面的凌虐是怎麼樣？

萬延海：大陸關於賣淫最近出現了一些不好的發展。在中國的重慶、廣西和浙江，先後處罰了三名女性性工作者，處罰她們的原因是因為她們有愛滋病病毒可是繼續從事賣淫的活動，觸犯了刑法打擊賣淫嫖娼的從重條款：如果知道自己有性病還繼續參與賣淫嫖娼，就依照傳播性病罪來處罰。傳播性病罪是特定和賣淫嫖娼有關，而非一般性的傳播性病，就是說，如果非賣淫嫖娼而傳播性病，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如果知道自己有性病還賣淫嫖娼，那就要受到處罰。中國的最高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有個意見，就是怎麼認定人民知道自己有性病呢？就是看看過去看病的紀錄。這條是很糟糕的意見，我們已經多次和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衛生部寫信要求刪除這一條，因為如果人們覺得有病而去醫院看病，而看病的紀錄會成為給自己治罪的依據的話，很多人最後可能就不會去看病，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中國公安部分經常嚴打掃黃，現在很多地方還是以發現安全套、避孕套來做為賣淫嫖娼的證據，這也是非常糟糕的做法。

關於中國性工作者的這些問題，如果討論合法化可能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見得可行。一些具體的政策，像是安全套的推廣，以及傳播性病罪的條款是否可以刪除，這是我們最近在爭取的工作。

毒品方面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中國政府在共產黨建國後有個勞動教養制度，是可以不通

過法院的程序來對於「壞分子」這些共產黨認為不好的人強制進行勞動改造，改造他的思想。那麼勞動改造的基本思路是洗腦，把你從階級敵人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或者從「壞人」變為「好人」。當賣淫嫖娼的問題出現之後，共產黨依照勞動教養制度的方法處置賣淫嫖娼的群體，毒品的問題被發現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也是依照勞動教養制度來處罰吸毒和販毒的。最近幾年中國政府對外宣布，取消勞動教養制度處罰吸毒人員，開始實行強制戒毒制度，這個強制戒毒制度實際上就是勞動教養，只是換了一個名字，而且強制戒毒制度的處罰期限比勞動教養要長，處罰程度也比犯罪還要強。所以在中國的吸毒人員當中，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被員警抓捕了之後，有一些吸毒的人會說自己是販毒的，因為他說自己是販毒的話，可以依照法院的程式去審理他的案件，而且處罰是有法可依也不會那麼嚴。如果說自己是吸毒的，我們算了一下，在員警的管制下，前後被監控和勞動教養的時間可以為期九年，有三年的社區戒毒期限，三年勞動強制戒毒期限，還有三年的社區康復期限。還有中國政府現在建立了一個非常糟糕的制度，你們臺灣人到大陸去一定要非常小心，就是利用互聯網、電子技術，建立了全國性的監控系統。這個監控系統最早是針對吸毒人員，二〇〇六年開始開發的，過去有吸毒記錄的人，政府把這些檔案和資料輸到電腦裡，全國聯網，這些人出現在中國任何一個旅店等等任何需要用身分證的地方，員警最快在二十分鐘內可以到達，也就是說公安部的中央系統可以偵查到政府在案的吸毒人員，如果出現在任何一個旅店，公安部可以在五分鐘內向基層派出所下達

指令去調查這個人，員警最快可在二十分鐘內到達。

在吸毒人員的動態監控之後，共產黨還開發了一個公安重點人員監控系統。這個目標是很廣泛的，少數民族的活躍人士、宗教活躍人士、維權律師、互聯網的活躍人士、作家、藝術家、政治異議人士、民間團體像我們這些民間組織的領頭的人，這些都在監控名單裡面。還有上訪的人、精神病人、恐怖分子、在逃犯、過去坐牢的人，全部都在裡面。你們可能聽說中國今年年初的時候，深圳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深圳市驅趕了大量外來的人口，他就是用這種動態的監控管理系統。今年二月的時候，胡錦濤和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國要建立一個全人口的動態管理系統，我們單位上個星期已經接到了派出所的一個表，要求把所有外來人口的員工資訊填好，報給街道委員會，要把所有的人口資訊放在一個動態的網路裡面。所以這就是警察國家，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但是現在也出現了一些變化，當你透過這個系統試圖控制一切的時候，這個系統實際上是很不安全的。

與會者：老師以及各位同學好，我想提出一點回應及三個問題。我想先回應剛提出問題的那位夥伴，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是藉由血液或者體液，我想表達的是，如果同性戀是愛滋病的成因的話，其實是一個污名，因為同志的性行為（男性的肛交插入行為）容易造成血液的傳遞，所以可能會導致他們得到愛滋病的比例稍微高一點，可是不管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只要沒有做好安全措施，都有可能得到愛滋病，而吸毒的這塊也是因為針頭共用，血液傳染，所以造成愛

滋病，所以請不要再污名這些社會上非主流的人。然後我要提出我的第一點問題，我很好奇中國公共衛生的相關措施是怎麼樣子的，因為感覺起來，好像針對愛滋病這塊，中央當局並沒有一個由上而下的全面性監控和防治，我好奇公共衛生這塊，中國大陸做得怎麼樣？另外一個問題是，最近臺灣因為器官移植使得一些人得到愛滋病，因此愛滋註記這件事情在臺灣受到多方爭議，我好奇愛滋病在中國大陸的污名情況，如果在那邊做愛滋註記這件事情，會有什麼影響？第三個問題是關於組織層面，中國大陸草根性的運動比較少，像是網路就需要翻牆才能夠得到比較多的資訊，我想請問老師您怎麼做到這些組織工作？謝謝。

萬延海：關於愛滋病的防治，最近十年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政治意願還是很清楚的，胡錦濤、溫家寶、前任的副總理吳儀、現在的副總理李克強，都在很多公開場合很高調的談愛滋病防治工作。中國愛滋病防治還專門頒布了一個法律《愛滋病防治條例》，還有一些附屬的文件，愛滋病的防治經費也比上個世紀多了很多，上個世紀大概一千萬左右，現在中央政府的財政大概投入將近十個億，還有地方財政的支持，還有一些國際援助基金。但是中國的問題是，它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它的經費都從上而下，通過衛生部門，這些衛生部門平時經費就很緊張，這些資金來的時候大部分是被挪用的。所以雖然講要在公共場所提供安全套，還有醫療機構要推廣標準的防護程式，要在醫療機構加強愛滋病的防護能力，為病人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這些法律上都有規定，如果看中國大陸的《愛滋病防治條例》一些法規的規定，比臺灣

可能還要清楚一點。比如說關於標準防護程式方面，大陸的法律是有規定的，臺灣的《愛滋病防治條例》好像沒有談這個問題。但是臺灣是個民主的社會、是個透明的社會，媒體是自由的，所以臺灣的愛滋病民間組織並沒有大陸的多，因為不需要那麼多，全民的健保、媒體很發達、學校教育，民間組織的社會服務和宣導功能事實上是很容易放大的。中國是個專制的社會，民間組織像是我們這個機構，我從一九九三年開始就在中央宣傳部的黑名單上面，下令媒體不能報導我，我做什麼事情媒體都不能報導，這是一件很受傷的事情，因為有些事本來是需要社會支援的，那得不到社會支持，影響就有限。去年的三月四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給全國媒體發了一條秘密的禁令，禁止報導愛知行和萬延海，這對我們來講是個問題。所以中國的民間組織數量遠遠的比臺灣組織要多，我們的數量比你們多，我們的辛苦程度也比你們大，但是我們效果事實上是遠遠不夠的。主要的問題還是一個，就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我們是一個腐敗的、不負責任的政府系統，你們是民主的、開放的系統，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關於台大的器官移植問題，大陸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雖然法律要求要對病人做標準的防護程式，但是衛生部有個口頭的、不成文的規定，所有到醫院裡輸血、住院、做手術的病人都要做愛滋病檢查，防止醫院的傳染、醫療糾紛、還有其他的一些考慮。但是很多醫院在發現病人有愛滋病之後就不給他做手術，所以台大的事件，在大陸的輿論中就形成「幸虧我們所有醫院的人都要做愛滋病檢查」的說法，強化了對檢查病人的要求。還有臺灣民間團體關於IC卡的問題

題，有個考慮，呼籲不能把愛滋病人的訊息放到電子卡片裡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大陸正在假模假樣的學臺灣的健保政策，在大陸推廣全民健保政策的就是幫臺灣設計全民健保政策的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的蕭教授，他現在在做大陸的衛生部顧問，昨天和今天，中國的衛生部長和美國的衛生部部長正在哈佛大學討論中國的醫療改革問題。大陸現在全國推廣「居民健康卡」，跟臺灣的「晶片卡」是一樣的，原來看病的卡是紙的，現在要建立全國的電子卡，要建立全國性的電子檔系統，一旦愛滋病人的資訊輸進去之後，可能會涉及到保密及隱私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醫療部門和公安部門的系統是聯網的，也就是說，未來愛滋病人的檢測、隱私、資訊，公安部門都是可以掌握的。七月初，中國的《法制日報》有篇文章討論，把兩類疾病的病人看作是政治危險的因素，一個是精神病人，一個是愛滋病人，完全是用「對社會穩定有威脅」的口吻來談論這兩個疾病：談到精神疾病的時候說到中國政府正在建立一個對精神疾病病人的全國監控網路，中國衛生部最近也在做全國的重症精神疾病病人資料庫，關於精神病人的監控是胡錦濤和周永康在中央黨校講話明確說的，現在這是公開說的一個東西。對愛滋病人的監控現在還沒有說的很清楚，但是意思已經講的很清楚了。

關於如何去組織，你只能去周旋。雖然這個社會是高壓的系統，但是這個社會當中的人是不一樣的，有很多人也在政府工作，他們可以用不同的名義來幫你。所以實際上雖然在一個專制的環境裡面，當社會中的人想要改變這個社會的時候，空間永遠是有的。你有你的朋友，還

有其他人，很多人是在政府裡面，用共產黨的語言來推動他想要推動的事情，所以當一個社會系統當中的人想要改變這個東西的時候，很多機會是有的。所以公眾的教育、思想意識的啟蒙還是很重要的。各種各樣的公民運動實際上在瓦解這個專制的集團，比如說宗教運動、性的解放運動，在不同的程度上，團體的運動都在瓦解專制的力量。不同的時期，政府對組織工作的政策也是不一樣的，在某一個時期它打擊的力度比較大，或者是有選擇性，不是對所有的團體都打，至少在某一時間，它沒有把我們當作要消滅掉的敵人，但是最後它把我們看作是一個目標要進行打擊。去年的目標是打擊，似乎今年它又不關我們的事了，這段時間很多員警不來了，去年員警是三天兩頭的來。

與會者：我想問一個比較無關的問題，關於肺結核。肺結核有那麼政治化嗎？肺結核的防治有比較順利或者也是很順利呢？

萬延海：同樣的問題大概還是會有，在經費的使用上，腐敗的問題可能還是一樣。大概在七月底的時候，我在中國國內的微博上面發起關於公共衛生腐敗的討論，我本來期待有很多愛滋病團體的人來介入討論這個腐敗，結果從雲南、西藏一帶有網友給我發消息，就是關於結核病腐敗的問題，例如資金沒有真正的使用。另外一方面，關於結核病人隱私的問題也會有，在愛滋病流行比較嚴重的地方會出現很多結核病交叉感染的情況，結核病的治療強調對人的督導，由醫護人員全程的去看著這個人進行治療；但愛滋病的治療似乎更強調隱私問題，所以在愛

滋病流行的環境裡面，結核病的醫療恐怕也會是個挑戰性的問題。

林純德：我的問題是關於孫海英跟呂麗萍的事件，因為有大陸同志的朋友在討論，他們之前在爭論中國有沒有同志運動，這次事件中一些主流媒體對同志人權有些比較正面的報導，他們就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成就。我也看到新一代的同志學生或運動者，他們也急於有一番不同的作為出來，我想要問的是，根據萬老師您的觀察，臺灣的同志運動前一陣子討論到我們現階段的運動目標好像不是那麼明確，就您的觀察，中國的同性戀運動現階段有沒有什麼成就，或者有什麼目標？

萬延海：關於孫海英和他的太太呂麗萍反同性戀的言論引起同性戀群體很強烈的反擊，總體上來，這是一個積極的事情。社群動員起來去反對污名化的事情，特別是反對社會名人的污名化舉動，這本身是個好事。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面，有一個問題對同性戀團體來說是個挑戰，那就是中國的同性戀團體還沒有一個針對的行動去挑戰專制政府。相對來講，反同性戀的團體、基督教團體有很強的力量是反專制的，所以如果這個時候，同性戀團體不去反政府的一些作為，比如說禁止同性戀電影、限制同性戀出版、限制廣播上性的節目、學校裡面沒有性的教育等等，如果同性戀團體對政府這些不友好的行動不採取一個積極挑戰的態度的話，對照基督教團體積極做這些反對的時候就有點風險。中國北京的維權律師是一個重要的民主力量，北京的維權律師很多是基督徒。那些為了生命的風險，為了民主與人權去戰鬥，被抓、被

酷刑，這些人很多是基督徒。如果同性戀團體不能認同從一個民主的、基本人權的方面跟基督徒站在一起去戰鬥的話，這場仗是打不贏的，因為在基本的政治民主和人類正義方面，同性戀團體並沒有做出表帥出來，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共產黨害怕社會革命，而基督教的力量是很大的力量，要擔心的問題就是共產黨利用同性戀團體去打擊基督教的團體。所以你會發現，當中央電視臺去採訪多支持同性戀的言論，呂麗萍夫婦並沒有被採訪，他們經常因為基督教的活動被國保、被員警找，他們是經常被員警找麻煩的人。我想，中國社會有很多反同性戀的力量，比如說基督教和法輪功的力量，但是我覺得現在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中國同性戀團體起來反歧視的話，主要的對象應該是專制集團，因為基督教團體是罵你，共產黨的專制集團是打你，它制定法律、限制你的很多東西。如果不能對專制做出挑戰的話，同性戀團體是不可能贏得一場道義上的勝利，這是我的評論。

與會者：剛才你提到愛滋的部分，我自己是做性／別組織，所以這部分我很好奇，中國大陸同志組織發展為什麼在這十年會有這麼快速的發展？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多做一點介紹。有沒有官方的資源介入？像臺北和高雄是有官方的資源介入，其他地方目前都還沒有，那這些民間組織和官方的立場是否都是一致的？大概的立場是怎麼樣？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是組織之間的問題，每個組織都隔這麼遠，主要是透過網路或者其他的連結方式？會辦像這樣的聯合

會議嗎？或是聯合的活動嗎？那參與的人又是怎樣的人？有沒有特定的階級？甚至是特定的性別？因為我們也有跟大陸的一些團體做交流，我們就發現說，幾乎都是以男性為主，而且幾乎都是做愛滋的，是不是因為我們接觸的團體的關係？還是在大陸的現況的確是如此？那服務的對象是否有任何的特色？比如說每個階級的人都能夠被服務到嗎？或者說跨性別的議題有被關心到嗎？最後想問關於政府立場的部分，像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在今年五、六月的時候不是有通過一個方案，那時候中國政府投的是「棄權」而不是支持也不是反對，那中國政府對同志和同性戀的立場是如何？尤其您剛一直提到NGO腐敗的情形，那指的又是什麼？謝謝。

萬延海：中國的民間組織在過去十年的發展，不僅在愛滋的領域，也不僅在性的議題方面，在全面的領域是一個爆炸性的發展。這來自於很多方面，人類生存本身面臨很多挑戰。比如說環境的破壞使得很多受害人起來，環境的破壞是全面性的，還有生存的危機，比如說中國的非典（SARS），當時給予中國人的生命帶來一場非常大的挑戰。大家應該記得歐洲在一場瘟疫之後開始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和社會的變化，二〇〇三年中國的非典事件之後，中國社會廣泛的維權運動也開始出現，這和中國SARS的流行應該有很大的關係。另外來說，社會發展本來就是有帶動性的，一個組織起來了，比如說我們二〇〇二年在河南的農村，當時是榮民總醫院的老院長捐了一點錢，我們在河南的農村一個病人的家裡面建了一個圖書館，開始的時候政府還來管、來查，後來圖書館繼續開，其他村莊的村民開始學習，覺得這個組織起來有些活動、和

外界有些聯繫，也能夠得到更多的實惠，所以到處都有病人和農村形成互助的、自己幫助自己的組織，然後跟外面聯繫，這是一個社會相互學習的過程。

在愛滋病的組織方面，在一段時間衛生部門還是支持的態度，因為它需要同性戀的團體來做一些社會教育的工作，比如說發放安全套，它需要有人去發。國際基金的介入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民間組織的發展不一定都是健康性的，政府在支援民間組織發展的時候也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腐敗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按照它的政治目標去發展政府自己的民間組織，政府派自己的人员去成立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或者打到民間組織裡面去，來對民間組織進行監控和掌握，這些情況也都是有的。同志組織的話，女同性戀組織在二〇〇四年之後也開始有發展，因為它沒有愛滋病組織的經費那麼雄厚，主要是國際上一些女同性戀、婦女的基金會提供支援，兩岸三地女同性戀的組織最近幾年是發展很快的。整體上來講，依靠衛生部門做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這些組織對權利運動不積極，主要是靠政府的資金來養活自己。那些純粹從男女同性戀的文化、認同、青年的成長、權利和社會組織發展的角度，這樣的組織整體上來講，參與的積極性更強一點，在權利議題上面更活躍一點。最近幾年在媒體上出現各種各樣對同性戀權益的一些報導，更多的是跟愛滋病防治工作沒有關係的團體，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與會者：我的問題很短，剛才萬先生提到說二〇〇三到二〇〇八年很多國際資金的來源，可以再說明一下主要的資金來源是什麼？那二〇〇八年以後有削弱的現象，甚至剛才有提到說

有個組織對你們有些質問，這原因是什麼？跟中國政府有無關係？如果有的話，和中國政府的國際政治操作有無關係？

卡維波：我想講的不是問題，只是想表達一下，性／別研究室成員邀請萬先生來台，我們當然知道在中國大陸除了萬延海以外，還有其他不同路線的同性戀組織，那我們為什麼只請萬延海先生來，沒有請別人呢？其實我們也請了山東的張北川，但他沒辦法來。我們是覺得萬延海和張北川在這塊運動做了相當久，他們的影響力和成就都是不容否認的，我們辦一個會議，當然希望各種意見都來，這次這樣做，也是一個開頭。萬先生很有系統、很有誠意的把他過去到現在包括他個人涉及爭議的事件都寫下來了，請大家有空時一定要讀一讀附錄，這些都是非常清楚、可以作為公評的事件，這點我們非常感謝萬延海。現在萬延海先生受到某種可以說是政治迫害已經到國外去了，我覺得這種時刻請萬延海先生來臺灣是很有意思的。我們在臺灣不是涉及大陸的情形，也不會涉入大陸內部的事情，但是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就是替歷史留下一些紀錄。

萬延海：我們的資金有個奇怪的現象是，在二〇〇二年之後我們獲得的資金基本上是那種會主動來找我們的基金，我們去申請的話都能拿到錢，而且資金量還比較多。要是各種各樣在中國境內的基金，中國境內有辦公室的基金，或者和中國政府合作的基金，我們試圖去申請，百分之九十是拿不到錢的，如果拿到錢，也是非常有限的，可能是因為政治審查的緣故。這些

基金會進來中國工作，需要考慮到跟中國政府的關係，還有一些基金是直接交給中國政府來管，我們得到的比較少。另外支持我們的基金更多的是對中國社會的民主、人權和公民社會有所期待的，這樣的基金會比較多，比如說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的國際開放社會研究所，還有一些美國企業家搞了個基金會叫 Levi Strauss 基金會。還有，像英國使館來找我們的時候，不是衛生部門的參贊，而是政治方面的參贊來找我們，也是主要做人權方面的工作。法國的一些機構也來找我們，法國的機構是愛滋病的團體，但是這些團體在人權方面都是非常活躍的，他們在愛滋病的運動當中是持有挑戰政府的立場的。他們選擇來支援我們的時候講得很清楚：「我們支援一個這樣敢於去挑戰權威的組織」。後來我們也得到德國一個基金會的支持，他們特定支持我們在新疆維吾爾開展健康和人權的工作。還有聯合國人口基金曾經支持我們兩次在性工作者當中的工作。其他的一些澳大利亞、加拿大的基金，愛滋病和人權方面比較活躍的一些團體，也給我們支持。二〇〇八年的時候我們的資金量有六百萬，二〇〇七、〇九年是五百萬，二〇〇九年之後給我們最大支持的索羅斯基金會，屬於國際社會開放研究所，跟我們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他們對我太有爭議，介入很多民間組織的爭吵，還有我對聯合國機構的批評，都非常的不滿意。兩年前我們出現了一個爭吵，後來我們就放棄了繼續申請。他們來信的用詞用語對我也是很難受，我們就放棄這個申請。我現在得到的消息是，有些國際組織到基金會去投訴了我們，不只到索羅斯基金會，而是到了美國很多個基金會，這個投訴可能最後產生

了影響，我們也不是特別清楚。別人問我為什麼，我只能說美國基金會在分餅的時候，我們曾經得到了這個餅，但我們並不參與分餅，所以別人怎麼重新分大餅、重新洗牌，這不是我決定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決定的。

朱偉誠：非常感謝萬先生從ZGO社運團體的觀點提供了這個部分，比上午那兩場比較知識界的部分顯得更複雜了一些，也讓我們對整個圖像有比較深入的瞭解。其實萬先生講得蠻簡略的，大家可以去參看他的附錄或者做一些搜尋，可能會更發現在這個推動過程中一些辛苦的過程和事蹟。我想萬先生也提出一些觀點蠻有趣的，比如說同志團體面對政府的態度，相對於大陸基督教團體採取批判威權或是獨裁的態度，同志團體是否在正當性上反而是比較弱勢，這是不可能我們原來沒有想到的一些觀點，乃至於政府可能利用兩個團體本來之間的矛盾，其實有點像分而治之的態度來處理，很多都是值得大家來思考的話題。謝謝大家的參與，也謝謝萬先生。

附件：

第一章 東單公園事件——一次特別的行動

從一九九〇年九月我和有關學者商議合作開展同性戀男子關於性衛生的知識、態度、信念和行為研究，到現在已經有七年多了。其間的風雨和坎坷是非常事人所能想像的。無數次，我希望放下這些工作，甚至變得悲觀。無數次，我為獲得新的認識而欣喜若狂。無數次，我為能夠戰勝恐懼而感到驕傲。無數次，我感到負罪。

一九九一年元月，一項叫做「同性戀男子和愛滋病有關的知識、信念、態度和行為調查及愛滋病教育研究」的課題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誕生。該研究所是衛生部下設的協調全國健康教育機構。一九九一年三月，該課題在研究所通過科研論證，決定由所長陳秉中擔任課題組長，承擔課題的社會影響和一切社會後果，決定由我擔任副組長，負責課題設計、執行和總結。國家愛滋病監測中心決定同時開展相關行為流行病學研究。上海健康教育所顧學琪表示願意配合在上海收集樣本。性學專家潘綏銘先生參與了本課題早期工作。社會學家李銀河女士表示願意協助研究。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查禁科的幹部們表示願意支持和參與我們的研究。

雖然課題被通過，經費也有保障，但我知道這樣的題目是相當艱巨的。一九八五年，南京鐵道醫學院達旦先生因研究自殺現象，他和兩名調查員被請到公安局。一九八六年，上海華東

師範大學趙敏老師因研究同性戀治療問題，被公安局六次傳訊，理由是他籌備治療用具時借用了裸體錄影帶。一九九〇年底，我和陳一筠女士從事妓女調查時，因為表現出對這些女子的同情和對簡單打擊運動的異議，於是被有關黨政幹部指責為鼓吹紅燈區。我們有一些不成文的約定：我們研究人員自己不應該是同性戀者，也不應該在研究中向這個方向發展。我們把同性戀者稱為「他們」，並且假定他們是不一樣的、是遠離社會的、可能會糾纏我們、難以打交道的。我們假定我們的課題是為了公共的利益，並且對同性戀者必然是善意的和必然有益的。我們討論了各種調查方法，就是沒有把同性戀者當成可以結交的朋友。我們假定同性戀人群或交往場合有不少秘密員警，我們會遇到干涉。我們假定我們必須得到公安部門的支持或默許，這個研究或教育工作才可能會順利進行；這一點或許是正確的，但如何尋求員警們的支持卻是更加重要。

負責警官相當熱情，也熱衷於社會題材的研究，但他肯定是單方面以為我們和員警們對同性戀者的認識和態度是一致的，所謂綜合治理，各司其職，社會主義大家庭嘛。因為彼此不熟悉，因為缺乏深入的交流，於是我們有了下面的過程和一個錯誤的決定。

一九九一年四月，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本課題部分參與者和參與機構召開了工作會議。大家通報了各自領域的資訊和動態，交換了對同性戀男子生活情況的看法。在討論如何接觸同性戀人群的時候，大家顯得比較矜持，「好像」都不熟悉情況。負責警官說話了。他提議由

員警先把同性戀者抓起來，然後由研究人員做問卷調查和血液化驗。他說，北京東郊民巷派出所的員警抓兔子（男性同性戀者）特別有經驗，一個晚上准能抓十幾個。當時，我感到震驚，因為我們的研究不允許傷害被研究人群，這已經寫入我們的課題報告，也是社會研究的基本倫理。但我不好拒絕這一提議，因為我害怕損害我們剛建立起來的關係，於是我詢問在座的心理社會學者這一意見是否可行。一位學者給出了圓滿解答。他說，這一方法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因為是員警執行公務，我們利用員警執法的機會開展我們的研究，不是因為我們要搞研究而讓員警去抓人。那位警官馬上說：「我們也要搞研究。今年（一九九一）公安部給了我們北京市公安局三個調查課題，其中之一就是關於同性戀的研究。你們健康教育所不搞，我們也要搞。這次就算我們邀請你們和我們一起來搞研究。」我沒有再說什麼，就提議在調查過程中對所有涉及的人士當場放人，不通知家庭或單位。於是，我們在上述提議基礎上達成協定。

這是一次終身難忘的會議。我們的決定是法西斯的。我當然充當了行動的元兇。我的內心感到不安。我們的目的是要幫助人，而不是傷害人。我們是熱情的工作者，卻因為缺乏經驗和態度不明確，從而盲目地遵從了員警們的習慣。我給自己的解釋是，雖然這樣的行動傷害了人，和和不良影響，但我們至少會瞭解一些情況，和公安部門建立好關係，當然還有保護好自己。這最後一點顯然是自欺欺人。我顯然不是什麼絕對的異性戀者，尤其是當時。

一九九一年五至七月，我度過了難忘的兩個月。在那段時間，每個禮拜，我有三個夜晚是

在東郊民巷派出所度過的。我們辛勤工作，充滿著幫助人的願望，卻伴隨著對人的傷害。

第一個夜晚，我就顯得難以堅持下去。一個中年男子坐到我的對面。當我們目光相對的時候，我顯得不安和失神。他用腳觸碰我的腳。我不能開始說話。我開始控制自己的情緒。我變得厲害一點，說話聲音堅定了，不再看他的眼睛。於是他老實了。而我發現自己卻多少變得法西斯了。我知道自己的不安是出於和對方相似的情緒。

我為自己捲入這樣的行動而感到深深自責。然而，一項多部門多方人士參與的行動簡單停下來是不現實的。然而，最不能寬恕的是，我在積極為自己參與這樣的行動尋找理由。我們開始理解員警的粗暴。我開始輕視人的感情。我需要為自己開脫罪責。這種需要曾經長期伴隨著我，直到現在。

在這前後兩個月的時間內，共有五十一名同性戀者被捉拿，先是審問，然後採血，最後是問卷調查。一般是當場放人，不通知單位家庭。有一人因為是所謂態度不好，被拘留。據說，後來有一人試圖自殺，沒有成功。有一位老人，當場跪在派出所內，說自己不是人，請求饒恕。

第二章 愛滋病求助熱線

為了預防和控制愛滋病和愛滋病病毒在我國的廣泛傳播，並防止或減少其不良的心理社會

反應。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日開通了「愛滋病求助熱線」，面向社會提供愛滋病有關的諮詢服務，熱線自開通之日起，即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積極關注並得到了廣大同行和新聞界的大力幫助。參見附錄：發展中的愛滋病求助熱線，作者：陳秉中、萬延海、鄭伯承、王群，出處：《中國健康教育》九（三）一九九三愛滋病專輯。

第三章 「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至十八日，陳秉中和萬延海參加「性傳播疾病的蔓延及其防治對策：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專家研討會」，發表文章〈把種子撒在肥沃的土壤上：同性戀文化和愛滋病教育〉，認為只有結合少數人的權利解放運動，愛滋病教育才能變成為人們積極參與的活動。

1. 社區的重要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世界愛滋病日主題是「社區參與」，旨在強調各種類型的社區參與對愛滋病戰鬥的重要性。只有通過所有社區在資金、精力和想像力上的投入，我們這個世界才有希望贏得這場戰鬥。

愛滋病的預防和控制不應該只是政府的責任，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私人 and 志願團體也能發揮重要作用。由於非政府組織植根於社區，它們更加熟悉社區的特定需要和文化特徵，因此它

們在幫助人們改變行為以及對感染者提供關懷和同情方面具有獨特的作用。

同性戀者社區已經被證明無論是作為信使還是作為看護者都是特別有效的。他們在發達國家早期是被視為愛滋病主要易感人群。就預防而言，同性戀者社區已經顯示出他們有能力做出良好的反應。我們已經看到同性戀者性傳播疾病和愛滋病病毒感染率急劇下降。

2. 人權保護和公共衛生

愛滋病及其有關歧視使得病人或感染者在就業、求學、旅行、婚姻、醫療和居住等方面發生困難，並且社會性的救助工作和教育工作難以實施；這不僅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而且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動搖了社會整體的穩定性。因此，從人權和公共衛生角度，我們應努力防止愛滋病有關歧視的發生。

a. 防止愛滋病有關歧視的人權原因

愛滋病是一個全球問題，因此需要做出全球反應。「全球愛滋病戰略」已經被世界各國接受並用來作為征服愛滋病的政策框架。這個戰略強調人權保護和發展，因此，這在歷史上也是第一個強調人權保護和發展的疾病控制戰略。

愛滋病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全球性挑戰。在人權方面，疾病威脅了全人類對於人權的尊重。因此，聯合國秘書長一九八七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強調，我們對愛滋病的戰鬥，「也就是對恐懼、對偏見、以及對由於無知而採取非理性行動的戰鬥。因為它們是人權受到危害的最主要原因

。」

人權的重要性基於它的基本原則，即社會在其所有活動中必須尊重人類一員的基本尊嚴。而且，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人的侮辱和歧視成為我們戰勝疾病的障礙；我們必須首先克服這個障礙，我們才能戰勝疾病本身。

不僅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視經常發生，而且對愛滋病高危人群的歧視也經常發生。在征服愛滋病的過程中，妓女和吸毒者往往成為社會嚴打和驅趕的犧牲品，受到社會的侮辱和排斥。雖然妓女和吸毒者的行為可能會觸犯法律，理應受到懲罰，但其也有做人的權利和尊嚴，這應該受到尊重。否則，我們就無法找到他們，並和他們一起戰勝疾病，而這對於愛滋病預防和控制戰略是不可缺少的。在我們的社會中，同性戀者受到歧視並可能失去工作和家園的故事仍有發生。

防止對愛滋病病人的歧視經常被指責為只保護了「少數人權利」，卻未能保護「多數人的權利」。其實，人權是一個普遍的概念，「少數人的權利」和多數人的權利根本上是一致的，並不能一刀兩斷。根據現有科學發現的愛滋病傳播途徑，全世界至少有數億人處於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危險中，而實際發現的感染者卻只有一千多萬。從某種意義上講，人人均可能感染愛滋病病毒。

b. 防止愛滋病有關歧視的公共衛生原因

從公共衛生角度，我們有足夠明確的理由強調保護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人權和尊嚴。

愛滋病病毒基本上都是通過特殊的行為和活動（如性交和共用注射器吸毒）而傳播的，而這完全可以由個人來控制。在多數情況下，愛滋病病毒的傳播涉及兩個人的行為；雙方或任何一方的行為保護都足以防止病毒的傳播。但是，我們應記住，傳播愛滋病病毒的行為常常是私下幹的，是不見人的事情，在某些社會還是違法的事情。

因此，如果愛滋病病毒感染導致侮辱和歧視（如不能上學和工作），那麼已經感染病毒的人或擔心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就會主動避免檢查，他們就得不到衛生和社會服務。那些急需資訊、教育、諮詢和其他支持的人們被「趕入地下」。那些害怕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可能不願去尋求幫助。由於教育難以開展，疾病預防和控制也是難以奏效的。

鑒於此，歧視危害了公共衛生利益。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強調指出，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人以及某些社會群體的歧視行為是對每個人健康的危害。保護他們的權利和尊嚴是預防和控制愛滋病公共衛生規劃的必要組成。這不是「多數人的權利」和「少數人的權利」的問題，而是，對未感染的多數人的保護根本上取決於對感染者的人權和尊嚴的維護。

3. 「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開辦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北京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舉辦了「男人的世界」文化

沙龍，這是一個專為同性戀男子開設的文化中心。這一次活動被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稱為石破天驚。這一次活動來了約三十五名同性戀者，還有一些記者和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邱仁宗教授到會發言：「在人類的歷史上，有許多問題是這樣產生的，那就是社會中的多數人、有權勢的人對於少數人或比較弱小的人們採取的壓制態度。婦女問題、黑人問題是這樣的，同性戀問題也是這樣的。……今天，隨著同性戀者自我意識的提高以及與之有關的社會和公共衛生問題的出現，中國的同性戀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人們沒有理由視同性戀為不道德。從行為的後果看，同性戀者會做出某種不道德或違法的事，但異性戀者也會做出這種不道德或違法的事，因此，這是這種不道德或違法的事本身，而不是同性戀問題。從行為的道義原則來看，很多人或許會認為同性戀行為不能生育，因而是反生命的；但是，並不是世人均要生孩子，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更是主張節育。性的功能主要是得到快樂，而不只是為了生孩子。」「同性戀行為本身屬於個人私事，政府或他人無權強行干涉。過份干涉公民私事，會導致許多不良後果，那就是公民的活動轉入地下，和公共機構失去聯繫，因而許多公共問題得不到解決。只要保護這些少數人的權利，公眾的健康才能得到保證。同時，政府有責任加強教育，幫助同性戀者改變某些行為，預防愛滋病。當然，同性戀者本人也有責任加強自我教育，避免危險行為。」

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說：「人類任何一個群體都存在健康問題，我們研究所有

責任來關心他們的健康；而且，一部分人的健康問題會影響其他人的健康。愛滋病和同性戀人群的關係就是這樣。」陳所長表示，我們研究所將在這種領域繼續和諸位同仁一道，共同探討，共同努力，把中國問題搞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銀河教授和作家王小波向與會者介紹了他們即將出版的書《他們的世界》。

隨後，男人的世界繼續舉辦活動，並且開始影響到新聞媒體的報導。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四日，男人的世界沙龍在北京西單海馬歌廳舉辦情人節特別活動，載歌載舞，迎來了中國同性戀的公開化。隨後，將近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中國各大小新聞媒介相繼報導或轉載了這次活動的消息。警方表示，同性戀沒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響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涉。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衛生部黨組下令取締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

4. 前期的活動和背景

男人的世界沙龍開始的時候並不是一個有預謀的計畫，只是準備一次活動，但其產生是有一定的背景和活動作為前提，而且，因為活動引起積極反響，所以打算堅持下去。

背景：一九九二年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比較寬容的一年，而且整個社會對同性戀也顯示積極的態度，包括安徽兩名女子同性戀者受到最高警方赦免，作家蕭乾關於同性戀寬容的文章，新華社內部參考中關於科學界對同性戀寬容的建議，《他們的世界》在香港出版，官方報紙《

《中國青年報》關於同性戀的報導，以及極其寬容的支持性的小環境，包括警方人士的支持。

前期的活動和醞釀包括（均為愛滋病求助熱線活動）：

一九九二年一月，召開警方官員和同性戀者（曾經被拘捕者）座談會，探討同性戀和相關政策。

一九九二年四月，召開兩次報告會，討論同性戀和愛滋病教育問題。

一九九二年五月和八月，愛滋病求助熱線多次來到北京東單公園進行愛滋病教育和交流對同性戀的看法。

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召開同性戀和愛滋病教育聯席座談會，有政府官員、學者、記者、社會工作者和同性戀者代表參加。會議認為同性戀是正常的和正當的，呼籲社會寬容和加強愛滋病教育。

一九九二年十月，熱線組織數次同性戀者小組座談會，並吸收同性戀志願者參加熱線工作，引起積極反應。

附件：公安部關於取締同性戀文化沙龍「男人的世界」的情況通報

【法規標題】公安部關於取締同性戀文化沙龍「男人的世界」的情況通報

【頒佈單位】公安部

【發文字型大小】公通字（一九九三）六二號

【頒佈時間】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

【全文】

公安部關於取締同性戀文化沙龍「男人的世界」的情況通報

失效日期：二〇〇一年四月五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

最近，公安部商請衛生部取締了在北京出現的同性戀聚會場所「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

現將主要情況通報如下：

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萬延海等人，以和同性戀者「取得相互信任，在一種文化氣氛中討論交流愛滋病的預防工作」為名，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辦「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

截止今年五月四日，已組織多次活動，並計畫從四月起每週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定期舉行活動。參加活動的有數十名同性戀者和一些學者、記者。該沙龍提倡同性戀公開化、合法化，認為同性戀不存在道德問題，要求保護同性戀的人權，尊重他們的權利和尊嚴，並鼓吹愛滋病有助於同性戀者的人性解放。沙龍的主要組織者、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愛滋病熱線」主持人萬延海公然宣稱：這是一個同性戀者的文化樂園，並企圖在中國正式成立同性戀者諮詢熱線和文化中心。

該沙龍的活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和有關部門的重視。衛生部責令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立即停辦「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活動，並將萬延海調離「愛滋病求助熱線」。

同性戀活動扭曲人性，違反社會公德，敗壞社會風氣，破壞家庭和睦，誘發刑事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是性病、愛滋病傳播的重要管道。近幾年來，一些地區同性戀活動有發展蔓延趨勢，已引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對此各級公安機關要引起高度重視，及時採取措施予以查處，對舉行類似「男人的世界」同性戀集會活動的，可以依照《集會遊行示威法》的規定處理或者會同有關部門責令停辦。對在公共場所聚眾進行同性戀淫亂活動的；勾引、教唆青少年與之進行同性戀活動的；雞姦幼童的，強行雞姦少年的，或者以暴力、脅迫等手段多次雞姦情節嚴重的，要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當前辦理流氓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八四〕法研字第一三號）的規定，以流氓罪提請檢察院、法院追究刑事責任。對在公共場所進行同性戀活動，不構成流氓罪的，或者構成流氓罪情節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要根據情節給予治安處罰、勞動教養或者作其他處理。

相關檔：公安部關於廢止部分規範性檔的通知（二〇〇一〇四〇五）

第四章 衛生部黨組處分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上午，大概在十一點左右，陳秉中所長來到我辦公室，心情沉重地宣

布了衛生部黨組的幾個決定：一、陳秉中和萬延海在《中國健康教育》雜誌上的兩篇學術文章涉嫌鼓吹人權、鼓吹同性戀、同情妓女；二、必須停止「男人的世界」同性戀文化沙龍活動；三、停止萬延海在「愛滋病求助熱線」主持人職務。

我當時完全不能接受。我不禁當時嚎啕大哭，而且事過很久不能接受已經發生的事情。我隨後立即通過媒體對外發布消息，公開挑戰衛生部黨組的決定，國際媒體紛紛報導此事。中國國內媒體，在新華社一個外教培訓班上，有十多個記者來我們這裡參觀，我也發布激烈的抨擊意見。有不少記者回去後撰稿，但稿件完全被槍斃了，因為涉及衛生部。

據悉，衛生部黨組的意見，來自政府四個不同的部門，包括公安部、新聞出版總署、中宣部和衛生部。衛生部長陳敏章對其秘書說，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工作超前十年，而我在電話對部長秘書表示，公共衛生工作當然要超前，而不能等到危機已經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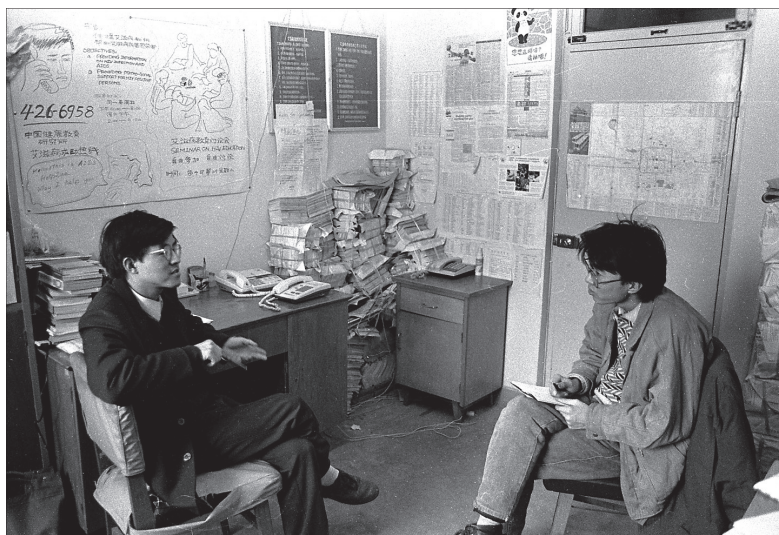
就在我們工作被衛生部下令停止之前，衛生部不同司局來電話，表達對我們工作的支援，並要求我準備講稿、展板去衛生部外事司介紹我們外事工作經驗，因為當時境外媒體和機構對我們工作的評價很積極。北京市公安局也派人來調研，表示在新時期、新的社會情況下，北京市有必要修改治安管理的一些規定，主要是涉及對同性戀者的態度上。據悉，公安局人員的內部報告寫的很積極。

聯合國機構、世界銀行、基金會、國內外媒體紛紛報導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工作。在出

事之前，我每週都要處理大量的記者、國際學者和學生的來訪。一九九三年春天，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為北京城一道風景線。

我也成為北京的電臺和電視臺的嘉賓，經常接受採訪和參加現場直播的節目。我一九九三年二月和三月在北京電臺大膽地呼籲保護同性戀者的平等權利，以及我在海南的《新世紀》雜誌連載的呼籲同性戀權利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

我當時並不清楚衛生部黨組決策的依據和背景，但顯然我是措手不及。我是一個直率的人，不會隱瞞自己的憤怒。我也不在乎發出挑戰的後果。當時，有人讓我給中紀委、監察部寫信，因為



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萬延海接受中國新聞社記者吳洪勝採訪。

圖片來源／李晏

案件涉及單位內部的腐敗；陳秉中所長建議我給衛生部寫信。我拒絕了。我認為衛生部決策缺乏基本的調查，我不會通過內部程序申訴。我諮詢了律師意見，是否可以起訴衛生部黨組，但被告知黨組不可以被起訴。

陳秉中給衛生部黨組前後寫了三封信，但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利用自己擔任主編的《中國健康教育》發表了一篇題為「同性戀、愛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稿，但不幸那一期雜誌被勒令收回。陳秉中先生也被通知提前退休，離開所長職位。在這之前，我應美國使館邀請，參加國際訪問學者計畫來美國訪問一個月。我放棄了。我不能自己的領導在受難，而我卻去美國訪問。據悉，公安部和衛生部對外應邀訪問美國有不同意見。

衛生部隨後傳達消息，萬延海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不得參與任何有關愛滋病和性學研究。我變得無所事事。我有幸開始結識單位外的記者、藝術家和環保主義者，我開始對書本的民間組織有更多具體的認識。通過不同途徑，我關注上了圓明園畫家嚴正學的案件，並在社會交往，接觸更多的朋友，包括一些律師。有律師朋友後來幫我建立了「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在此之前，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對我來說，只是書上的概念，而不是現實中具體的人和事。

據悉，公安部對我們的活動有一個檔，把我描繪為鼓吹不道德的人士；參見附件。

我在單位開始受到排擠。有人對我吐吐沫。書記找我談話，擔心我心理是否有病。我的工資開始被剋扣，每個月只有一百三十元工資。

一九九四年三月，我創辦了北京愛知行動項目，中國青年報、新華社、中國新聞社、健康報、中國婦女報、中華工商時報紛紛報導了我們專案成立的消息。公安部隨後發布檔給全國婦聯，要求中國婦女報停止對我們的報導，把我說得很壞和很危險。我從此正式進入黑名單，媒體朋友知道我被監控，不能對我進行報導。幾個月後，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強行辭退我。

我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媒體上，是一些新生代的記者，不知道過去的事情，我的名字就開始被提到了。

第五章 北京愛知行動專案成立

一九九四年三月下旬，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宣布成立，依託在北京現代管理學院健康人類學系下，但活動相對獨立。一九九八年，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建立網站，一九九九年建立郵件組。

愛知行動項目顧名思義，「愛」與「知」的組合，產生了一些意義的聯想。「愛知」音和「愛滋病」近似，表示這是一個關注愛滋病防範和關心愛滋病人生活的項目。和過去「愛滋病」一詞的區別是，「愛知」表示用愛心關懷和科學知識挑戰愛滋病流行，而不是追究疾病的過錯，而「愛滋病」一詞中的「滋」頗有怪罪の意味。「愛知」同時表示關於愛的知識、性的教育。

愛知行動專案自從成立以來，始終關心的主題是：推動公眾對愛滋病的防範意識、維護愛

滋病人的權益和維護性少數人的權利。

期間主要工作有愛滋病預防教育、安全性行為和安全套推廣、《愛知簡報》編輯、調查員警抓捕同性戀者的情況、推動同性戀非病理化、以及在國內外宣導男女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的權利。

1. 北京愛知行動專案的成立

民間愛知行動專案的建立是繼續專案人員過去在官方研究所裡被阻斷的工作。項目主要人員萬延海曾經工作於衛生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男性同性戀者和愛滋病教育的研究，並在一九九二年開設「愛滋病求助熱線」，對公眾（特別是社會邊緣群體）開展愛滋病教育，其中「男人的世界」是熱線開展的一項增進社會對同性戀者的認識和同性戀者人群對愛滋病防範意識的活動。

一九九三年五月，衛生部下令停止萬延海在上述領域的工作。當時，北京已經有了一些公民組織的活動，比如環境保護組織和藝術家群體的活動。一九九三年底，萬延海和北京現代管理學院取得聯繫，成立了「健康人類學系」，主要活動就是愛知行動項目。

一九九四年三月，專案對外宣布成立。專案宗旨：推動公眾對愛滋病的防範意識、維護愛滋病人的權益和維護性少數人的權利。健康報、中國婦女報、中華工商時報等報導專案成立消息。

同時，美國伊麗莎白·泰勒愛滋病基金會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邱仁宗教授，援助一萬美元用於北京地區同性戀和雙性戀男子的愛滋病教育工作。

2. 《愛知簡報》

《愛知簡報》創辦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到一九九六年底，正式對外發表十四期。每期一千份，通過郵寄、街頭發放和朋友圈子散發。郵寄對象主要是專家學者、媒體記者、民間志願者等。街頭發放主要在北京地區同性戀活動場所，比如東單公園和三裡河街心花園。內容包括愛滋病防治資訊和國際男女同性戀權利運動。資訊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愛滋病專案、國際媒體文摘、國際組織的資料、專案調查報告、以及科學文獻。

《愛知簡報》第十四期針對同性戀非病理化工作，編輯專刊，郵寄給全國數百家精神病院和中華精神科學會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修正工作組成員。

3. 特殊性問題和愛滋病教育研討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六日至八日，「愛滋病教育和特殊性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十二條關於同性戀的決議，遞交中國政府、立法機構、新聞界和社會各界。召集單位：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來自全國各地的醫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倫理學家、法學家和其他有關專家、政府官員和同性戀者四〇餘人參加這個會議。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就同性戀

問題展開多學科全國性研討活動。專家們就愛滋病和社會行為、愛滋病教育、同性戀問題在當代中國的提出、同性戀的社會調查、同性戀的生物學基礎、同性戀和心理衛生、同性戀的倫理學和法律問題、同性戀和公共衛生、同性戀和公共教育、同性戀的社會救助等問題展開討論，達成共識和建議。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具體組織了這次會議。參見：<http://www.aizhi.org/azxd/aidandgay.txt>。

4. 同性戀者權益調查報告

北京愛知行動專案調查了一九九四年春天天津員警抓捕男同性戀者和一九九五年八月北京員警抓捕男同性戀者的情況。一九九四年六月走訪安徽巢湖兩名女子同居事件當事人。經常性處理敲詐勒索事件，協助報警和提供諮詢。訪問同性戀老人，瞭解歷史遺留問題，比如因同性戀被勞動教養後的養老和社會歧視問題。

一九九四年底，撰寫同性戀權益狀況調查報告一份，先後在澳大利亞、香港和美國的會議和出版物中發表。

5. 沙龍和社會網路

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六年，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在公園、街心花園、茶館、會議室和私人住宅裡召集若干次同性戀權益主題沙龍（見本書23頁）。一九九四年七月中旬在北京三味書店舉辦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六日龍泉賓館會議（一）

（圖片來源／萬延海）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張北川新書座談會（圖片來源／萬延海）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六日龍泉賓館會議（二）（圖片來源／萬延海）

新書《同性愛》（張北川，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初）座談會（見本書23頁），是類似聚會中重要的一次。沙龍聚會為同性戀權益工作培養了許多人才。

6. 愛滋病教育和外展工作

北京愛知行動專案經常性在同性戀群體聚集場所發放愛滋病教育材料、《愛知簡報》、媒體報導影本、《同性愛》等資料。一九九九年，支援北京同志之家開展安全套派發和安全性教育工作。專案也通過媒體文章、電臺節目推動性安全意識。

7. 同性戀和精神衛生

愛知行動項目關注精神衛生問題，包括同性戀和精神衛生的問題。一九九六年十月，北京愛知行動項目率先發布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的呼籲，編輯專題簡報，發給全國各地的精神病院和中華精神科學會精神疾病診斷標準工作組成員。為推動同性戀非病理化工作，組織翻譯國際同性戀心理科學文獻，召集同性戀社群人士和精神衛生專家座談會，鼓勵精神疾病診斷標準工作組專家在同性戀社群裡研究同性戀者、而不是限於在心理診所裡開展研究。

一九九七年，項目負責人萬延海訪問美國南加州大學，專題研究同性戀和精神衛生問題，推動了中美兩國精神衛生科學家們在同性戀議題上的對話。一九九七年八月底，和北美華人社群關注同性戀權益人士一起創辦北美華人性別與性傾向研究會，創辦同性戀中文網刊《桃紅滿

天下》(www.cssm.org)。桃紅滿天下為中文社會瞭解同性戀的科學知識，包括精神衛生知識，做出重要貢獻。

8. 同性戀、青少年和家庭

愛知行動專案從一九九五年開始關注同性戀和家庭相關議題，翻譯和編輯出版同性戀和家人、家庭處理同性戀孩子的文獻，發表在《愛知簡報》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專案和美國同性戀者親友組織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9. 對保守主義教會的研究

一九九八年底，基於極端主義宗教運動對人們性觀念的影響，項目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七月對韓國統一教會進行了研究，發表《跌倒的牧羊人》，阻止了統一教會下屬的國際教育基金會和我國政府部門包括衛生部的合作。專案也對法輪功運動及其性觀念進行了研究。項目對美國基督教右派運動及其禁慾教育政策進行了長期觀察和研究。

10. 《愛知行動》網站和郵件組

一九九八年七月，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創辦《愛知行動》網站，一九九九年創辦愛知行動專案郵件組。網站和郵件組極大地改變項目長期不被關注的局面。網站和郵件組發布大量同性戀權益資訊、國際上關於同性戀和愛滋病相關文獻。

11. 同性戀網站發展和網站會議

愛知行動專案一九九五年開始通過志願者運用電子郵件和國際社會取得聯繫。一九九六年初，項目舉辦同性戀社群互聯網學習班一次，幫助社群骨幹掌握互聯網功能。一九九七年，項目負責人萬延海訪美期間參與創辦《桃紅滿天下》電子刊物。一九九八年後，項目和廣州同志、愛情白皮書網站等保持合作交流關係。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七到十八日，來自中國大陸各地、香港、美國和加拿大的男女同性戀網站編輯和相關社會服務小組、研究人員和志願人員三十餘人聚集北京，討論了中國同志網站發展和發揮同志網站在同性戀人群中開展愛滋病教育的作用等話題。加拿大公民社會專案資助了本次會議。本次活動完全由民間自發召開。北京愛知行動專案具體組織了本次活動。

第六章 在看守所的經歷

我所遭遇的酷刑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深夜，我在北京一個同性戀酒吧參加完一個同性戀影視展映活動後，在回家路上，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拘留。我開始以為是河南政府派人來抓捕我，很擔心被人謀害掉，但到達國安局看守所後，反而放鬆了下來。我覺得事情不會很大，以為自己很快就會出來。

我和兩個同齡人住在一個監室裡，一個人大我一歲，一個人小我一歲。兩個人都是經濟犯罪，一個人是證券公司的中層經理，一個人是國有企業的總裁助理。大一歲的同室說，進到國家安全局看守所的人，大多在四十歲上下；年齡小的，尚未有資歷和分量來發生引起國家安全局關注和需要拘捕的行動，年齡大的，有這樣的資歷和能力的人，已經處於國家安全局不能採取行動的地位上了。我們三個人的共同經驗也是，正在處於事業的輝煌期，自我感覺美好、無畏，自己認為完全沒有問題的時刻，一出手產生巨大的震盪並出現被拘捕的情況。

我第一周很有信心，也在監室哼哼小調，在審訊時比較坦白，也與預審人員對抗，反駁其不當的質問和指控。但是，第二周情況出現變化，手銬、電棍是小意思了。我被要求雙手銬上，後來雙手反銬在座椅上，雙腳蹬在地上不能動彈，既不能站起來，也不能坐下去。我這樣持續蹬在那裡十四個小時，從早上十點到深夜十二點，吃飯和上廁所也受到限制。我試圖變換姿勢緩解小腿部的脹痛。

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審訊警員坐在牽著我手銬的椅子，用手銬清脆地、有節奏地敲擊著座椅板。我的精神幾乎快要崩潰了。我假裝要倒下去的樣子，用反銬上的手銬互相摩擦，發出各種噪音，破壞那個令人瘋狂的清脆、有節奏的聲音。

第二天早晨，我按時起床。腿上沒有特別的感覺。我試圖站起來去衛生間，突然我一點知覺沒有地九〇度倒了下去。我意識到自己腿部和腳部傷得不輕，我每次站起來和行走，就慢慢

地、把握好平衡。後來，每次去審訊室和回到監室，一名高個子警員會攙扶著我，這個員警並且抱怨，審訊就好好審，不能這樣對待人家。我內心非常感動。

第二天繼續審訊。故伎重演，我屈服了。我雙腿完全不能支持，內心充滿恐懼。我擔心自己可能被搞死。如果真有一個向我提供情報的人，我或許就供出來了。

我被抓是因為對外發布一個標有「機密」字樣的河南省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彙報檔，是河南省衛生廳給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的。我在電子信箱裡收到一份匿名郵件，附件就是這份河南省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彙報文件。我閱讀後發現河南省衛生廳完全在撒謊，就發布了這份檔並撰寫評論文章。我在二〇〇二年五月初和河南省衛生廳三名官員見過面，他們要求和我們合作，支持我們的愛滋病防治工作，但要刪除網站上的揭露河南愛滋病血液災難的文章，我拒絕了。

審訊圍繞著究竟是誰發給我這份郵件的。我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誰發給我的。難題出現在面前，如果我堅持我不知道是誰發給我的，我就會繼續受到折磨，但我又不能冤枉人。坦白地講，如果真有那麼一個人，我可能會供出來的。

我也在捉摸究竟是誰發給我文件的。三個人中，似乎有一個人比較異樣，眼神裡似乎在傳出話來。我就堅持，如果我必須說出一個人來，我絕對不能說這個名字。我說出了一個名字。上午的審訊結束了。我幸運自己沒有說出後來被拘留的「馬士文」這個名字，否則真是說不清楚了。

審訊在下午繼續。我情緒也緩解了。我一開始就要求糾正我上午的供詞，我回到我不知道是誰發給我郵件的意見。預審警員接受了我的糾正，但卻提出來我提供偽證的問題。我表示，我是在壓力下面不得不做出這個供詞，但與事實不符，我不能冤枉人。預審警員一翻臉，責問誰給我壓力的？我連忙糾正，沒有壓力，是自己思想糊塗，現在予以糾正。預審警員接受了我的糾正，但要求我承認自己提供偽證和認錯。我承認自己提供了偽證。反正不涉及別人，我認了。

審訊結束了。第二天起來，心跳比較快。感覺身體很虛弱，害怕出現不好的情況。我就叫了看守所的醫生，希望可以測量一下心電圖。醫生來了，簡單詢問了情況就走了。但是，醫生終於沒有來給我檢查身體。

下午，預審警員再次提審，詢問我為什麼和醫生說自己預審遭遇刑訊的事情？責問誰刑訊逼供了？於是，我被要求單腿著地，用我已經幾乎無法站立的腿腳站在那裡，員警用電棍追擊著我。我只好改口認錯。

有一個星期，預審人員沒有來。同室們猜測，我要放可能就是近期的事情。最後一個星期的審訊，完全是走過場，我以為接下來要審問的問題，基本沒有詢問。提出來的問題和需要我回答的問題，基本就是朝著尋找釋放我的理由，給自己臺階下。筆錄也非常清楚，看起來就是要放人了。但我依然心理充分焦慮和不確定。

需要我認錯的時候，我馬上認錯。需要我寫保證書，我小學的時候寫過，應該不難。出來的最後一天晚上，我被叫去談話，兩個警員明確告訴我，第二天上午就會釋放我，但需要和我談談心。警員明確表示，認為我在做有意義的愛滋病防治工作，但希望可以和政府有溝通和合

作。

我寫下保證書。高高興興地認錯了，表示願意和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合作。對我的處分是「責令具結悔過」。我被釋放了。

法新社要來採訪，希望有一個公園裡做採訪。我安排在安定門附近的肯德基店，因為我無法正常行走，我不希望酷刑問題成為我釋放後的一個熱點，我也不希望自己成為戰場。我希望把問題回到中國愛滋病防治工作和河南的愛滋病問題上面去，我希望借助媒體的熱情把公眾焦點回到河南愛滋病問題的處理上面去。既然政府表示，抓萬延海是因為他做錯了事情，而不是要反對他的愛滋病工作，那麼把愛滋病問題提出來給政府，或許可以推動政府做的好一些。

四年後，國際愛滋病大會前夕，人權觀察愛滋病項目安排人在我辦公室做了一個採訪。我決定說出酷刑的真相。但因為是英文，無法像我用中文這樣清晰完整地表達。

很長一段時間，我走路是一高一低的，兩個腿的感覺不一樣。左腳趾不能正常翹起來，動作要慢一些。直至今天，我的小腿和腳腕部位依然時常酸脹。我不能盤腿坐下來，不能蹬的時間太久，否則就會出現小腿和腳腕部位酸脹的症狀。我原先有盤腿打坐的習慣，現在已經不能

再盤腿打坐了。

走出看守所

同室們說，這是一所學校，讓人學會平衡。有些人就是不見黃河不死心，不見南牆不回頭。

看守所所長們在第一次提審我的時候表示，萬先生，你會成為聖賢，在中國可以處理好同性戀研究和愛滋病的研究，是了不起的事情，但在你成為聖賢之前，你要吃點苦頭。他們是看守所管理人員，負責在押人員的飲食起居和監所管理，不負責案情的調查。我們聊到了河南賣血傳播愛滋病的情況，其中一人表示，他很清楚，他就來自河南，他的一名戰友家裡就有三個人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死亡。

看守所的管理人員總體上對我不錯的。同室們疑惑，為啥就沒有對我驗血查身體？我入監第一周看守所就開始改善監室衛生，給每個人兩個大箱子分類存放物品。大家感覺每天菜湯裡肉末增加了。要 eat 好一些，就得自己來花錢買。正好我準備機構註冊，隨身帶了幾千元現金。

九月二十日上午，中秋節那一天，我被釋放了。我的物品被歸還。在看守所裡使用過的多數物品沒有帶走，但看守所所長表示，你用過的鞋子一定要帶走，你要穿著這雙鞋子走出去，要走好。我被看守告知，在這裡聽到和看到的一切不要對外說，要爛在肚子裡。那位對我不錯、個子高高的員警來送我。

前一天晚上找我談話的兩名員警前來接我，送我回家。我詢問哪些事情可以對外說，答案是聽到的其他人的案情情況不得對外說，本人案情資料可以對外說。

在前一天晚上的談話中，員警詢問我，出去後如何對外解釋自己被釋放，如何處理媒體和各界的關注，會不會反悔讓當局難堪。我表示，不用擔心，我就表示自己認罪了，寫了保證書，我被釋放了。員警擔心影響我的形象，我表示，不用擔心，我是做愛滋病防治工作的，愛滋病工作做不好，你來追究我的責任，我不是來做政治好漢的。後來，兩名警員一直和我聯繫，直到二〇〇七年春天。我們建立了很好的友誼、信任和信心，這是一些在為他人考慮的傢伙。

出來了。覺得世界暈乎乎的，身體很虛弱。回到住所，和家人通話。我堂弟過來一起吃飯，他給我介紹了外面救援的情況。

第二個來電話是美國費城愛滋病組織 Act-Up 成員凱特，她來電祝賀我獲得自由。她的電話讓我非常興奮。我在看守所裡的時候，就非常相信有個叫作 Act-Up 激進行動組織會幫助我獲救。我並不知道這個組織詳細資訊，只是一九九五年去悉尼開會在街上遇到一個這個組織成員，別人介紹說這是一個激烈的愛滋病組織。

下午，更多的朋友來看我。胡佳、盧彤景等人。大家一起聚餐。「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名稱已經核准，章程已經起草好，股東們同意繼續註冊。九月二六日，我們向北京市東城區工商局提交了申請，二七日批准，國慶後領取到營業執照。

這是一個發起人走出看守所一周後註冊成立的民間團體。當時，國際社會和中國學界依然在討論中國有沒有獨立的民間組織。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的企業註冊，顯然成為一個獨立民間組織的標誌。愛知行迎來了機遇，可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差不多——二年後才理解到世界對於我來說真正發生了那些變化。我沒有失去這個機遇。

第七章 成立北京愛知行研究所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二〇〇二年九月在北京工商部門註冊。北京愛知行研究所致力於開展非營利性愛滋病防治工作，旨在預防愛滋病在脆弱人群和邊緣人群中的傳播，幫助感染者和受愛滋病影響的人群得到必要的醫療和心理支持，反對歧視，保護其基本人權，改善其生存狀態。

在一個成型的組織和廣泛的社會網路支援下，我們為中國男女同性戀者和跨性別社群開展了更多健康服務和權益宣導工作。

1. 性安全教育和安全套推廣

二〇〇五年開始，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積極推動北京和各地男同性戀和跨性別人群的安全套推廣和性安全教育工作，提供教育材料和安全套，開展相關培訓和能力建設，提供法律支援，幫助志願者購買意外保險，為男同性戀人群和跨性別人群的愛滋病防治工作創造安全的環境。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招募志願者直接在北京地區各個場所，包括酒吧、會所、浴池、公園、街心花園、網路社群聚會和文體娛樂活動場所，開展性安全教育和安全套推廣工作。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也通過合作組織、互聯網站、出版物和文體活動，每年在數十個城市開展男同性戀人群和跨性別人群愛滋病防治工作。

二〇〇六年—二〇〇九年，愛知行每年提供五十—六十萬適用於男男同性戀群體的安全套和潤滑劑，其中一半用於北京，一半用於其他城市。

2. 同性戀文化、藝術和體育活動

愛知行支持男女同性戀和跨性別社群文化、藝術和體育活動的發展，認為同性戀社群正常的文化、藝術和體育活動，提高社群的自我認同和社群團結，凝聚社群力量。愛知行參與和支持過的活動有：酷兒電影節、紀錄片拍攝、畫展、文化節、國際電影節、卡拉OK比賽、以及各項文化體育活動。

3. 同性戀社群組織發展

愛知行鼓勵男女同性戀和跨性別社群組織發展。愛知行支援女同性戀組織及其網路建設，支援北京和雲南的跨性別群體組織發展，支援全國男同性戀組織開展愛滋病防治工作和社群權益保護，支持學校同性戀團體的活動。愛知行活躍在全國各地的同性戀社群健康、權利和文化

藝術活動中。

4. 國際交流和合作

愛知行推動了大陸同性戀活躍人士和團體與香港和臺灣地區同性戀團體的交流，參加了二〇〇六年和二〇〇七年臺北市同性戀文化節和遊行，參加二〇〇六年—二〇〇九年香港反恐同遊行，參加二〇〇八年和二〇〇九年香港同性戀遊行。愛知行推動中國同性戀團體和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國際男女同性戀人權委員會和大赦國際等團體的聯繫。二〇〇八年初，支持國內多個團體參加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亞洲會議，參與該團體亞洲地區的活動。二〇〇九年七月，支持同性戀活躍人士參加世界同性戀運動。

5. 出版物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支持了男同性戀健康和文讀本《點》的創刊和發展，支持了女同性戀讀本《LES+》的創刊和發展，支援了網路刊物《風雨同行》的工作。同時，愛知行印刷了同性戀、跨性別和心理學讀本若干，用於同性戀社群的自我認同教育。印刷同性戀法律手冊，用於社群法律教育。

6. 同性戀網站的安全和網路

愛知行研究所鼓勵同性戀網站的發展，推動網站發揮愛滋病防治作用，推動社群權利意識

。二〇〇五年六月，愛知行支持了第二屆全國男女同性戀網站交流會議。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月，國內諸多男同性戀網站受到駭客攻擊。愛知行介入調查，提供法律援助，阻止駭客攻擊行動。隨後，組織網站安全工作會議，建立民間協作機制。

愛知行致力於互聯網自由和同性戀網站的發展。二〇〇二年六月，在同性戀網站受到網路服務商關閉的情況下，致信服務商，要求不得歧視同性戀網站。二〇〇九初—二〇一〇年初，政府發起打擊低俗網站運動，導致數十個男女同性戀網站被關閉。愛知行隨後提供法律援助，公開呼籲保護同性戀網站的自由。

7. 法律和法律援助

愛知行為同性戀群體提供法律諮詢和法律援助。在同性戀個人和群體權益受到侵害時，積極參與調查和提供幫助。愛知行介入了大部分公開的同性戀權益案件，包括同性戀網站被駭客攻擊、同性戀網站被政府關閉等。

8. 北京同性戀活動中心

愛知行聯同北京地區多個同性戀團體合作，於二〇〇八年初創辦「北京同性戀活動中心」，支援北京地區同性戀群體的文化娛樂活動，幫助同性戀個體和群體的認同，推動社會寬容。

9. 精神衛生、青少年和家庭

愛知行通過讀本推動同性戀、跨性別和精神衛生的工作，特別針對青年人自我認同和處理家庭關係。愛知行支持校園裡的學生社團和學生活動，致力於創建同性戀友好校園環境。

愛知行二〇〇五—二〇〇七年，連續三年組織同性戀大學生夏令營，開展同性戀和心理學、同性戀人權、同性戀研究、藝術等題材的培训，為中國同性戀權利運動培養後繼人才。

10. 日惹原則和權利宣導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六日，日內瓦，一份由專家制定的性權利與性別平等的全球準則，即《日惹原則》(Yogyakarta Principles)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發布，這份文件的發布成為全球女、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羣權利的重要里程碑。同日，愛知行連同北京的同性戀權益組織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中文版的《日惹原則》。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在印尼日惹舉辦的國際法學專家會議上，通過了「將國際人權法應用到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相關問題的《日惹原則》」。這些原則確立政府與行為主體停止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羣的暴力、虐待和歧視的法律標準，確保充分的平等。發起這些原則的專家有聯合國人權高級官員，聯合國的獨立專家，聯合國的各實體機構，法官，行動主義者與學術界的人士。愛知行負責人萬延海參加在印尼日惹召開的《日惹原則》起草會議。

二〇〇八年底，愛知行致信中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要求把男女同性戀權利保護納入國家

人權行動計畫。二〇〇八年底，愛知行和六〇多國內支持同性戀權利的團體聯合致信外交部，要求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大會上參加支持同性戀的聲明。二〇〇八年底，愛知行致信國家廣播總局，要求取消對同性戀電影和電視的禁令。二〇〇九年底，愛知行致信教育部和衛生部，要求在學校開展性教育，包括對同性戀友好的性教育。

第八章 二〇一〇年，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經歷挑戰

一九九七年元月一日，我離開北京到達洛杉磯，開始在美國南加州大學女性主義研究中心和一研究所訪問。離開之前，精神壓力很大，身體也不好，經濟上拮据，而且擔心隨時被抓捕。一九九五年九月中旬，世界婦女大會前夕，北京市海澱區國家安全局即開始找我談話，隨後一到重要時刻即例行訪問。期間，一些意外事件打擊了個人心理上的防線。

二〇〇二年十月下旬，江澤民訪美最後一天，我獲准離開中國去美國，參加富布賴特專案和與家人團聚。期間，我於二〇〇三年初回國二周後即離開中國，直到二〇〇三年底回到中國。剛剛從看守所出來，我心理壓力依然很大，同時我認為，我需要離開那個環境一段時間，我需要讓國家安全部門換個視角來看待我和我的工作。我發現，我在國外的時候，當局會依照統戰對象來對待我，而當我在國內的時候，我會被看成監控或專政的對象。

二〇一〇年四月三十日，我和家人一起到了香港，隨後離開中國。這一次，我把出走製造

成為一個事件，用以提醒國際社會關注我本人的安全，以及關注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和中國公民社會組織的生存困境。

二〇一〇年，北京愛知行研究所遭遇了多重挑戰。在困難面前，我們履行了對中國愛滋病防治和人權保護工作的承諾。二〇一〇年，我們繼續在北京、雲南和河南等地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男女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女性性工作者、毒品成癮人士、流動人口包括生活在北京的維吾爾人、青年學生等開展愛滋病預防教育、推動愛滋病治療和關懷、提供法律服務、宣導人權保護，為愛滋病維權人士和維權組織提供支援和聲援，包括對出現危機的愛滋病維權人士的救援。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開展愛滋病社會行為研究、媒體和新媒體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和宣導工作，記錄人權狀況，發布愛滋病相關人權報告。

二〇一〇年，我們開展了下列研究，發布研究報告和資料彙編：

- 1 北京東單公園男同性戀遊客愛滋病社會行為
- 2 北京市女性性工作者男性客人愛滋病社會行為
- 3 新媒體用於員警打擊同性戀群體後的社會反應
- 4 嚴打掃黃背景下媒體對性工作相關報導情況
- 5 愛滋病和社會工作

6 性工作者與性工作者健康組織參加全球基金的情況

7 《愛滋病防治條例》中兩個告知的分析和建議

8 《承諾宣言》核心指標與中國法律政策規定（彙編）

我們發布了下列愛滋病相關人權報告：

1 《維吾爾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健康、居住及其他人權狀況報告——以北京市的流動維吾爾族為例》

2 《中國毒品成癮者法律人權報告（2009）——來自民間組織的觀察》

3 《2009年中國愛滋病法律人權報告》

4 《呼籲政府履行責任 在愛滋病防治工作中切實加強人權保護——北京愛知行研究所2010年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聲明》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繼續參與廣泛的公共衛生和人權運動，包括：

1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一日，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所長萬延海致信全國人大《關於罷免李毅中的工業和資訊化部部長職務的公民建議書》，主要涉及中國互聯網自由、愛滋病防治工作的網站和愛滋病組織的電子通訊工具受到清理整理等問題。

2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所長萬延海在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人權分會聽證會作為嘉賓發言，提出「建立和中國公民社會的戰略關係」。

3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日，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所長萬延海在美國國會行政機構中國事務委員會聽證會上作證，介紹自己作為愛滋病工作者在中國遭遇的各種迫害

4 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和十一月二五日，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分別致信中國全球基金愛滋病專案中央執行機構、全球基金秘書處，要求落實中國全球基金愛滋病專案關於建立支持性環境的承諾。

5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八日，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發布退休衛生官員、前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致胡錦濤公開信，要求就血液災難導致的愛滋病流行問題，追究河南省前領導人李長春、李克強刑事罪責。

6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愛知行研究所聯合多家民間組織，「強烈要求浙江省公安廳和衛生廳取消《浙江省預防處置精神病人肇事肇禍行為實施意見》，保護精神疾病患者人權和防止濫用精神病迫害人權。

附件：發展中的愛滋病求助熱線

作者：陳秉中 萬延海 鄭伯承 王群

出處：《中國健康教育》九（二）一九九三愛滋病專輯

為了預防和控制愛滋病和愛滋病毒在我國的廣泛傳播，並防止或減少其不良的心理社會

反應。我所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日開通了「愛滋病求助熱線」，面向社會提供愛滋病有關的諮詢服務，熱線自開通之日起，即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積極關注並得到了廣大同行和新聞界的大力幫助。

本文擬從熱線的宗旨，服務對象，工作方式和活動等方面對正在發展中的「愛滋病求助熱線」作一全面剖析和動態的描述。

一、開辦「愛滋病求助熱線」的背景

1 截至一九九一年底，我國已發現七〇八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已有八人發生愛滋病。

2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以電話熱線作為提供愛滋病諮詢服務和幫助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重要形式。

3 我國部分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正悄悄興起一股「熱線熱」。熱線已進入城市人的生活，並影響著中、小城市和城鎮地區的求助者。例如，北京有十幾家從事心理諮詢、社會教育和保健服務的熱線。

4 愛滋病高危人群大多生活於社會的邊緣狀態，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壓力。愛滋病病毒感染的發生會引發更多的指向他們的負性社會態度。因此，他們需要人們的幫助。

5 愛滋病有關的錯誤資訊和迷信在人群中傳播對於人們的正常生活和交往、對於人們的自我防範能力以及對於人們正確對待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經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因此，在目前大眾媒體的愛滋病教育功能不能得到更充分發揮的情況下，諮詢（包括電話諮詢）就顯得更為重要。

二、開辦「愛滋病求助熱線」的宗旨

愛滋病諮詢熱線是一座架設在諮詢人員和求助者之間的橋樑。通過電話交談，諮詢旨在達到：

1. 幫助求助者防止感染愛滋病病毒或將其傳給他人；
2. 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親人提供心理社會支持。

預防性諮詢有五個主要步驟：

- （1）明確求助者的行為是否屬於愛滋病高危行為；
- （2）幫助求助者認識到其行為的危險性；
- （3）幫助求助者認識到他們的行為與他們的生活和自我形象是相關的；
- （4）幫助求助者認識到他們有能力改變自己的行為；
- （5）幫助他們改變自己的行為。

支持性諮詢幫助尋求幫助的感染者對自己的生活做出決策，增強自信，改善家庭和鄰里關係，從而提高生活品質。諮詢也為感染者的親人和家庭提供支持，從而使他們能夠對感染者提供關心和鼓勵。

三、「愛滋病求助熱線」的服務對象

「愛滋病求助熱線」的教育活動包括三個方面：諮詢、同伴教育和大眾教育。

愛滋病諮詢的適宜對象有：

1. 擔心自己可能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
2. 想要做愛滋病病毒檢測的人；
3. 已經做了愛滋病病毒檢測的人（無論感染與否）；
4. 無視自己過去或現在的危險行為，不準備做愛滋病病毒檢測的人；
5. 沒有意識到自己因過去或現在的特殊行為而面臨愛滋病病毒感染危險的人；
6. 愛滋病人和其他與愛滋病病毒感染有關疾病的病人；
7. 因愛滋病病毒感染而陷入就業、住房、經濟和家庭困境的人；
8.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家人和朋友；
9. 與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經常接觸的衛生人員和其他人。

愛滋病同伴教育主要在那些和男人發生性交的男人，性工作參與者（妓女、男妓、嫖客和皮條客）和靜脈注射毒品者中間開展。

愛滋病大眾教育主要利用報紙、雜誌、電臺和電視等大眾媒介形式。

四、「愛滋病求助熱線」諮詢人員的組成和培訓

熱線諮詢人員由具有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和法學等專業背景的工作人員或大學生組成。他們志願參加，接受基本的愛滋病知識和其他知識的培訓。在正式參加工作之前，所有諮詢員均經受實習考察，考察合格者，由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發給諮詢員聘書，並和諮詢人員簽定協議，有效期半年。所有諮詢員必須遵守熱線工作規範和保密制度。

五、「愛滋病求助熱線」的工作方式

「愛滋病求助熱線」面向社會的教育方式分為：諮詢（包括熱線和門診諮詢）、同伴教育者的培訓和深入社區的教育活動、大眾教育以及通過網路建設和討論會調動社會各界參與愛滋病教育。

電話交談是熱線諮詢的主要形式，熱線還設有預約門診服務。

培訓高危人士中的積極人士作為教育其他人士的同伴教育者，或到高危人士集中的場所進行面對面的教育活動。

利用電臺、電視、報紙和雜誌等大眾媒介，傳送熱線服務的資訊，增強公眾對愛滋病的意識和公開討論有關愛滋病的對策和社會觀念。

「愛滋病求助熱線」還通過網路建設和交流等活動調動社會各界參與愛滋病預防和控制工作，例如：公安幹警參與對性工作參與者的教育、中學教師參與對中學生的教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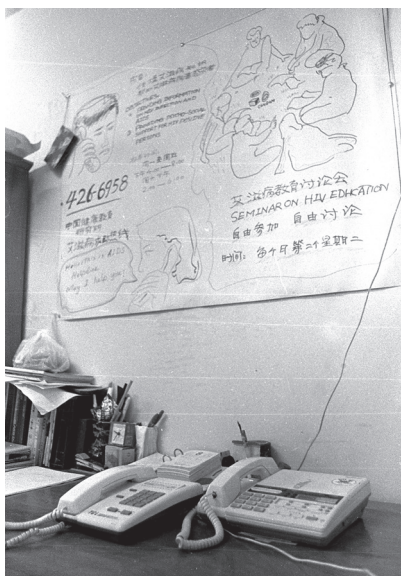
六、「愛滋病求助熱線」資訊發送方式

「愛滋病求助熱線」的電話號碼，服務宗旨和服務時間等資訊主要通過大眾媒介向外發送；同時，熱線還通過傳單，招貼畫和面對面的方式傳送有關資訊。

七、愛滋病教育討論會

從一九九二年八月開始，每個月第二個星期二，一個人們可以自由參加並自由發表意見的有關愛滋病教育的討論會在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定期舉行。在每一次討論會中，我們選擇一個不同的主題。

一九九三年，討論會將在全國範圍



愛滋求助熱線。（圖片來源／萬延海）

內對愛滋病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交流。

八、社區參與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世界愛滋病日在一個共同的主題「社區參與」下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活動。世界衛生組織選擇這一主題，旨在強調各種類型的社區參與愛滋病預防的重要性。只有通過所有社區在資金、時間和想像力上的積極投入，我們這個世界才有希望贏得這場戰鬥。

九、捍衛少數人的權利

愛滋病是一個全球問題，因而需要作出全球性反應，「全球愛滋病戰略」已被世界各國接受並用來作為征服愛滋病的政策框架。這個戰略強調人權的保護和發展。因而這在歷史上也是第一個強調人權保護和發展的疾病控制戰略。

愛滋病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全球性挑戰。在人權方面，疾病威脅了全人類對於人權的尊重。因此，聯合國秘書長一九八七年在聯合國大會上講到，我們對愛滋病的戰鬥；「也就是對恐懼、對偏見、以及對由於無知而採取非理性行動的戰鬥。因為它們是人權受到危害的最主要原因。」

人權的重要性基於它的基本原則，即社會在其所有活動中必須尊重人類一員的基本尊嚴。而且，對愛滋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人的污辱和歧視成為我們戰勝疾病的障礙；我們必須首

先克服這個障礙，我們才能戰勝疾病本身。聯合國秘書長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在世界愛滋病日強調，全世界必須向愛滋病開戰，而不是向愛滋病人開戰。

不僅對愛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視經常發生，而且對愛滋病高危人群的歧視也經常發生。在征服愛滋病的過程中，妓女和吸毒者往往成為嚴打和驅趕的犧牲品，受到社會的污辱和遺棄。雖然妓女和吸毒者的行為可能會觸犯社會的法律，理應受到懲罰；但他（她）們也有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這應該受到尊重，否則我們就無法找到他們，並和他們一起戰勝疾病，而這對於愛滋病預防和控制戰略是不可缺少的。

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同性戀者受到歧視並可能失去職業和家園的故事仍時有發生。

防止對愛滋病人人的歧視常被指責為保護了「少數人的權利」，卻未能保護「多數人權利」。其實，人權是一個普遍的概念，「少數人的權利」和「多數人的權利」根本上是一致的，並不能一刀兩斷。根據現有科學發現的愛滋病傳播途徑，全世界至少有數億人處於愛滋病毒感染的危險之中，而實際已發現感染者卻只有一千多萬。從某種意義上講，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愛滋病毒。

因此，如果愛滋病毒感染導致了污辱和歧視（如不能上學和工作），那麼已經感染病毒的人或擔心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就會主動避免接受檢查，他們就得不到衛生和社會服務。那些急需資訊、教育、諮詢和其他支持的人們將被「趕入地下」。那麼害怕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可能不

願去尋求幫助。由於教育難以開展，疾病的預防和控制也是難以奏效的。

十、全國愛滋病求助熱線網

自我所於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日開設「愛滋病求助熱線」後，近日，雲南省健康教育所，上海市健康教育所，石家莊市衛生防疫站和瀋陽市健康教育所又加入了我們的合作行列，從而昆明、上海、石家莊、瀋陽和北京五城市的「愛滋病求助熱線」就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網路。

目前，「全國愛滋病求助熱線網」仍在不斷地尋求新的合作夥伴。

十一、一九九二年諮詢內容分析

自一九九二年四月七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愛滋病求助熱線」共接到一一二六人次諮詢電話，其中愛滋病諮詢八九七人次，性病四九人次，其他問題諮詢一八〇人次。在愛滋病諮詢求助者中，男性七五一人，占八三・七二%，女性一四六人，占一六・二八%；外地打來求助電話二一八人次，占二四・八〇%，本市打來求助電話五七二人次，占六五・〇七%，還有八九九人次不明來源，占一〇・一三%；求助者以十五至四四歲的中青年為主，一般具有中學或大學學歷；已婚者和未婚者打來電話的人數大致相同。

求助者一般關心愛滋病的傳播途徑（四二・二一%）、症狀和體徵（三七・三二%）、檢測方法和地點（三二・六五%）預防措施（一六・八二%）治療和藥物（一六・五〇%）安全

性生活（一二・五一％）婚姻與家庭（四・八九％）、法律（三・八七％），還有一些問題涉及經濟，工作、上學和社交，有三五人次（三・九八％），求助電話中求助者處於危機狀態中（主要為自殺企圖）。

一五・〇％的電話自稱來自同性戀男子，四・一〇％的電話自稱來自雙性戀男子，二・三九％的電話自稱和賣淫嫖娼有關，一・八二％的電話自稱和共用注射器有關。有一名求助者自稱為靜脈吸毒者，有一名求助者自稱已感染愛滋病病毒，有四名求助電話來自感染者的家屬，男友和同事。

求助者一般以瞭解愛滋病知識為主，但也有很多因為身體的症狀或自身行為而感到憂慮的求助者（占一六・五二％）。

十二、「愛滋病求助熱線」的發展計畫

今後，「愛滋病求助熱線」將一如既往地在我國的愛滋病教育和相關文化運動中發揮先鋒模範作用。計畫如下：1. 繼續發展「全國愛滋病求助熱線網」，爭取在今後的一兩年中在全國各大城市均有自己的合作夥伴；2. 「愛滋病求助熱線」將繼續深入處於「地下」的愛滋病高危人群，一方面吸收高危人士參與教育計畫和行動，另一方面努力捍衛他們的合法權益；3. 「愛滋病求助熱線」作為愛滋病教育的催化劑，從一開始就極大地推動了大眾媒介和社會各界參與

愛滋病；4. 「愛滋病求助熱線」將利用網路中心和分中心在各地的文化優勢組建各自的社會網路，從而調動全社會參與愛滋病預防和教育；5. 建立「愛滋病求助基金會」，用於愛滋病教育和幫助愛滋病病毒感染者；6. 創辦愛滋病諮詢和教育的專業交流雜誌；7. 編寫愛滋病諮詢培訓手冊；8. 開展有關愛滋病諮詢和教育的國內和國際交流；9. 開展愛滋病有關的社會行為研究和教育評價工作。

